



他的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

作者 | 史全伟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后，在以东北军张学良、第十七路军杨虎城、中共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会谈中，周恩来充分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并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三方在政策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共识，被称为“三位一体”。周恩来还特别强调：“三位一体”的紧密团结极其重要，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12月25日，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并跟着他到南京负荆请罪，反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无理扣押，导致东北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唯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

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的团结，其中虽有不同派别，但都能服从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当张学良离开西安时，虽然指定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但于学忠不是东北军的嫡系，又远在兰州，无法发挥指挥作用，实际上由被称为元老派的王以哲和何柱国在西安主持军中工作。东北军内还有一个以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抗日同志会负责人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他们都是中下级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抗日。张学良在时，他们受到张的信任，能够通过向张学良提出建议来影响东北军。张学良不在时，元老派就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老少两派之间，对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存在很大分歧。这种思想混乱和内部不和，严重削弱了东北军的力量。

杨虎城受张学良的委托，名义上可以指挥东北军，但第十七路军的力量较东北军而言太小，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又没有人能帮助他共同控制局势，这使他感到十分

为难。两军的高级将领，在兵谏扣蒋、逼蒋抗日、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时，能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少数人对联共本有一定的保留，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对两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不少人有不同程度的动摇。

为了进一步实行分化，国民党南京方面在谈判中故意提出甲、乙两种方案，让西安方面选择。甲方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乙方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第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第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在这两个方案中，接受甲方案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方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东北军东开后，“三位一体”自然瓦解。



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方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方案。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就更突出：第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方案；东北军高级将领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方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方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共产党在西安是张、杨请来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在建议地位。1937年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对作战的胜利没有把握。周恩来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具体局势，向杨虎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为了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第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方案坚决拒绝，对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并可伸至咸阳；第三，主要的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1937年1月20日，派去见蒋介石的代表李志刚回到西安。杨虎城召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没有谈出结果。第二天，请周恩来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派李志刚携杨函再飞奉化，接受蒋的甲方案，并对中央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驻防地区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张学良如一时不能回陕请给以名义。红军同意退回陕北。30日，西安方面和南京方面在潼关大体商谈就绪，决定采用甲方案。在当时，这是一个可行的较好选择。只要三方联合一致，实现这个方案，对西北局势此后的发展是



△ 西安事变纪念馆

有利的。

这时，东北军少壮派的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了。他们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有爱国热忱，对张学良怀着很深的感情，思想比较激进，但有时容易流于偏激。他们认为，无论接受甲方案或乙方案，张学良都不能回来了。因此，他们自下而上地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同中央军开战，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杨虎城虽忧虑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又担心中央军来后会对他报复，在这点上同少壮派有着共鸣。这样，少壮派的主张一时在西安占了上风。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一直同各方面广泛接触，宣传坚持“三位一体”，坚持和平，重点是做少壮派的工作。1月27日晚间，少

壮派的50多人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向周恩来请愿。少壮派表示：我们坚持要求张学良将军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从国家前途、团结抗日前途以及张学良前途等方面，耐心地给他们分析利害关系，并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这些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跪下，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一直闹到半夜。最后，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他们才走了。



少壮派刚走不久，天还没有亮，南汉宸又赶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凌晨3时，杨虎城把我从床上叫醒，对我说，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周恩来听后，立刻对南汉宸说：“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得不起朋友的事。”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到红军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达成共

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用，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的情势。本来是不应该打仗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打。当晚，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且对他们说：

“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毛泽东、朱德等从延安来电，也同意这个方针。

这时，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

团长以上军官40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一战。决议上由到会的40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但又

无法说服少壮派。第二天，他们派飞机到兰州把于学忠接来，因为张学良临走时指定于学忠代他统率东北军。31日晚，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最高级会议，参加的有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少壮派在室外旁听。会议一开始就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于学忠这才表示：“我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他又分析军事形势，认为现在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是不利的。王以哲和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见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就说：

“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又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原来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最后，他着重地说：“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并且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出现问题的。”

会议的结果，大大出乎少壮派意料：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签字。但少壮派仍不甘心，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便不顾大局，决心除掉王、何。

2月1日晚，街上已贴出“除奸”的标语，西安城内的情势急剧紧张起来。2月2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由卫队营一批军人闯入王以哲



△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



住宅，开枪将王打死。何柱国得到消息，逃入杨虎城住所才得以幸免。孙铭九等人还以勾结南京方面泄露机密等罪名，杀死了多名东北军军官。

接着，少壮派几个青年军官又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便明白了来意，这时如果示弱或是表现畏惧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周恩来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威严肃目光的逼视下，这几个青年军官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枪，还一个个低下了头。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

“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这几位莽撞的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这时，西安城内充满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人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但周恩来依然沉着冷静，完全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向东北军表示作为朋友的哀悼和关心，他带着李克农和刘鼎，不顾危险，第一时间赶到王以哲将军家中吊唁。这时，离王以哲被害才一个多小时。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家中乱

成一团，灵堂还没布置好。当听说中共的周恩来等人前来吊丧时，年仅18岁的王以哲小舅子听信谣言，拔出手枪，将子弹推上了膛，一边藏身到幔帐后边，一边大声说：

“就让共产党人活祭我姐夫！”王以哲的夫人听后，大吃一惊，一把拉住弟弟，说：“千万不能！人家共产党的周恩来是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真正的朋友。”说话间，周恩来等已来到王以哲灵前，他一边呼唤着“鼎芳，鼎芳”，一边痛哭失声，泪水夺眶而出。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王以哲的那位少不经事的小舅子也不由得跟着痛哭起来。千钧一发，如果不是王夫人及时制止，那将是怎样的结果？事后回想起来也足以令人心悸！随后，周恩来安慰家属，帮助迅速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们深受感动，消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王以哲在东北军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高呼誓为王以哲报仇，马上掉转枪口，向西安开拔，前锋已达临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因东北军西撤，中央军随即开进渭南。

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孙铭九等问他们何以自处。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个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三个方案：一是，他们三个人引咎自戕；二是，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是，将他们送到红军中

去。周恩来在这样复杂而困难的局势下，经过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牺牲他们，毅然地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目标，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考虑到西安局势紧张，周恩来经与博古等商议，决定将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撤到三原红军驻地，自己仍坚持留在西安，力挽危局。

这几天，可以说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困难的日子。他周围就像堆满了火药桶，各种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们大都又是共产党的朋友。情况的发展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使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全部付诸东流。这几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当时正在西安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后来回忆道：“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敞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正是以真诚的态度、有说服力的谈话和无畏的勇气，使大局得以维持，并且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广大将士中赢得了信任，赢得了友谊。

（本文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乱云飞渡仍从容》）